



拉斐尔绘《雅典学院》。

志就是抽签选举。根据统计学原理，随机抽取的样本才具有代表性，只有抽签当选的希腊公职人员才可以称之为“representative”（平均数意义上的代表）。现代民主通过投票选举的是高于——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能力上——普通民众的人，这些人一经选出，便可依据自己特定的阶级立场和个人意愿进行政治裁断。现代民主用投票替代抽签还因为结果可控，有组织的少数人可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无组织的民众。现代民主的核心制度是政党，而政党通过与“选举政治”并行的“权力政治”排斥任何民主参与的企图——简单地说，权力政治指的是如何从精英小圈子中指定候选人供民众去选择；选举政治指的是，如何让这些候选人被民众选出。民众选出的不是他们的代理人，而是借用他们的名义得以脱离他们的政府阶级。

抽签和投票在各自制度体系中的意义也不可同日而语。抽签选出公职人员只是希腊民主的一部分，而且是次要的部分，政治生活的主体部分是公民不借助任何中介或代表的直接参政。而投票选出“统治者”却是代议民主的核心程序，政治的实质内容，即立法、决策和施政则与民主无关。集会民主自身就产生权力，代议民主只是为权力的产生提供程序合法性，权力本身的运行则在民主（选举）之后和之外。

更本质的区别还在于，直接民主制中直接在场的和

代议民主制中被代议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前者是观点，后者是利益。观点不可能被他人代表或代理，能够被代理的只能是客观性、可拆分、可折中与妥协的利益。因此，现代民主只要选出利益代表就万事大吉了，直接民主却要求公民全过程的参与，而且，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却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这样的政治，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让生活中的劳作和功能得以安息或悬置，它标志的是人类无（职）能的存在，不能为任何一种职业或使命（Calling）所界定。这就是政治的“庸”性或多余性，对于人类的生物学生存完全没有必要——“不用而寓诸庸”，仅因其自身之故（像游戏那样享受其过程）而被喜爱。这样的政治因为迎合了人类对于非功利生活的向往，而具有某种理想的意义，后世的政治形态只能在与这种状态的对照中得到部分的和勉强的承认。

这种全民参与的业余政治与今天越来越专业化的官僚政治的区别可以参照陪审法庭的运行来说明。陪审法庭（Dikasteria）作为希腊政治制度的核心建制，当然可以看作当时的司法机构，就像公民大会可以看作当时的立法机构一样。但它们又区别于现代职能分化的专业政治机构，在这两个不同的机构中出场的却是同一个希腊公民群体，而且按照同样的审议逻辑（简单多数）投票表决。这意味着，决不可以把现代专业视域下的司法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目标赋予陪审法庭。一位被告在法庭上直言不讳地说，他之所以在过去承担了那么多的公益捐助（liturgy），“为的就是提高我在你们眼中的地位，这样，当我遭遇不幸时，就能更好地为自己辩护”。这段话透露了希腊人不同于现代的对于法庭审判的理解：审判在主要的方面不是指向当事人的“所为”（是不是犯了被指控的罪行），而是他的“所是”——他是一个足够称职的好公民？演说家埃斯基涅斯在总结自己的庭辩经验时就承认，犯罪证据通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告在社会关系中被接受的程度。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有经验的辩护人根本不屑于“证明事实是不是发生了，或者如何发生的”，而是在事实尚未确认的情况下就转向